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特征及其理论后果

张今杰, 林艳

(浙江大学哲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湘潭大学哲学系,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20世纪初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繁盛使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句法—语义学并未真正完成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应以语用学来补充句法—语义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对语言和主体先验地位的强调,对方法论唯我论的克服和对论辩的奠基特征的重视。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后果是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科学主义传统的对话和融合。

关键词: 阿佩尔; 先验语用学; 欧陆自解释学; 英美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2-0157-05

阿佩尔毕生致力于以指号理论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改造。他的先验语用学的提出,即是这一工作的成果。阿佩尔认为,先验语用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因此而使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科学主义传统有了真正共同的课题和思维方式,从而由分裂和封闭走向对话和融合,先验符号学或先验语用学将成为取代知识论的第一哲学的新范式。

一、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的完成

阿佩尔认为,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用惟一合法的形式化语言(即统一的“科学语言”)进行惟一的逻辑推理,以保证任何一种理论构成的明确性和无矛盾性。物理科学是这种“科学语言”的典范,因此自然科学的语言和方法成为一切称得上科学的学科效仿的范式。科学主体的“意向性”意识被视为“心理学”的问题而由语义学问题所取代,“康德关于对象意识的逻辑形式问题被转化为对象描述的逻辑形式问题”^{[1](14)}。阿佩尔对语言分析哲学的评价是:他们过分强调语言的句法——语义结构,而忽视了指号的语用学维度,因而消解了主体,导致了语义学的“抽象谬误”。

后期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的多样化规则取代了统一语言的“逻辑形式”;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也更多地把言语的意义依赖于主体间的情境条

件;皮尔士和莫里斯以三维指号学补充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句法—语义学。这些都使得意义理解更多地依赖于交往共同体所达成的一致性,都意味着语言分析哲学的语用学维度。因此,他认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不是什么秘密”^{[1](108)}。然而,阿佩尔认为,对语用学的强调和改造,都只是行为主义的和经验论的。他说:“目前的指号学研究不能表明三维指号关系是构成主体间有效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因而语言学转向没有完成”^{[2](136)}。因此,只有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来发展语用学,才能真正实现语用学转向。在他看来,这种行为主义的或经验语用学维度不能处理指号过程的语用学维度的准先验功能,不能通过指出皮尔士意义上的指号过程的三维功能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主体间有效知识的可能性的先验指号学条件来完成语言学的转向。

阿佩尔认为他自己的使命在于关注三维指号关系中的语用学维度,使语用学维度与句法—语义学维度结合起来,为知识的主体间有效性的可能性提供先验保障,最终克服先验语义学的“抽象谬误”,以“语用学转向”来完成语言学的转向,或者说,实现语言学转向的实用主义完成。要破除“抽象谬误”,我们确定所指对象的语用学必须同时也是一个因果的意向的链条,必须使名称的使用与情境相结合,也就是当名称的意义能用实物来介绍时,名称使用者能

有意向地反思地确证一个存在的也是因果链上有效的所指。因此,“我们对指号的所指的真实对象的认识就是显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能由语用学转向来完成,也即通过指号认识的语义学维度的语用学综合来完成”^{[21](138)}。

二、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特征

为了彻底完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阿佩尔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在阿佩尔那里,先验语用学有时又称先验指号学。从其名称即可看出,阿佩尔的意图在于一方面通过语用学联结康德式的先验哲学和20世纪哲学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赋予语用学以先验特性而使20世纪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拓宽其研究视野,成为第一哲学在当代的第三范式。这样一种融合了先验哲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先验语用学无疑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它力图克服方法论唯我论。

阿佩尔认为,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主体—客体的二元分裂。他论证道:“从笛卡尔到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问题以及科学的逻辑与方法问题一直是根据人的认知的主客关系这个基本哲学预设而提出并加以论述的”^[31]。众所周知,近代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科学和哲学都是以主客分立作为其理论前提的,这样一种理论前提显然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复兴和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生态危机和人的意义危机。在阿佩尔看来,这种理论前提的另一个后果是方法论唯我论和语义学抽象谬误,因此,“除非认识论作为一个整体不再以求助于所谓‘认识的主客关系’为基础,而是以关于世界某种东西的交往理解和公意构成这样一种先验实用主义结构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科学的解释学向度,也不可能理解这一向度的规范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31]。

阿佩尔通过研究发现,前指号学的哲学通常都只在主—客关系中来考虑认识论的问题,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古典实证主义、施莱尔马赫和早期狄尔泰的解释学,都中了方法论唯我论的圈套,它们都是基于对象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统一和白明来思考的。而“语言作为某物之为某物的认知的中介化机构被忽视了,而这种对语言的忽视总是意味着忽视主体间传统中介化”^{[11](134-135)}。

而语言分析哲学的统一的“科学逻辑”的根基也在于科学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分离,并且这种分离必须扩展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科学领域中,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有浓厚的方法论唯我论特色的。阿佩尔认为,只有通过主体间沟通的高扬,才能克服方法论唯我论,才能消除语义学的“抽象谬误”。阿佩尔认为,这种主体间沟通是知识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它已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得到了彰显。因为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的共同参与的前提,取代了那种对他人的移情而达到理解的方法论唯我论。在言语行为理论和皮尔士的指号学理论中,以主体间沟通为特征的语用学维度都得到了强调。因此,阿佩尔认为,“由于把交往共同体设定为认知主体(认知本身是一种以指号为中介的作用),这样一种先验哲学就克服了传统知识论的方法论唯我论”^{[11](136)}。

其次,强调语言和主体的准先验地位。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着眼于改变经验语用学的经验描述的行为主义倾向,以求分析对主体间沟通的普遍条件制约的问题,因此,他必须强调语言的先验性,以“先验主体”取代经验主体。

阿佩尔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我们用以描述的工具,语言指号作为我们认识真实客体的中介,不应只被视为语义学研究的对象,而应成为理论哲学的主题。语言不应成为经验科学的客体和理论表述的工具。语言的功能作为解释和主体间有效表征的中介不能被客观化,因为,语言是以符号为中介的知识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而不是一种可能的对象。惟有通过语言指号,一个主体的意向意义与别人的意向意义才可能达成一致,从而他才能意指某物。因而在语言“意义”中与他人的意向意义的统一乃是对康德的“知觉综合”中经验材料统一的可能性条件。方法论唯我论以主—客关系为前提,只注重句法—语义学维度,抽去了主体间性的语用学维度,消除了包括语用学在内的语言整体功能的准先验地位,从而语言的所指很可能代表空类,而没有时空中的真实事物与之对应,造成抽象谬误。因此,阿佩尔认为,指号或语言功能不仅是语言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更是一切主体间有效知识的先验条件。阿佩尔很清楚,“在主体间性合法性要求之后,关于知识可能性的先验问题仍是首要的问题”^{[21](64)}。

按照阿佩尔的看法,如果我们只发挥语义系统的先天特性,而忽视指号关系的先验主体,那么,我们绝无可能解释康德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所

以“我必须认为一种‘先验的语言语用学’是可能的,在这种‘先验的语言语用学’中,论辩主体能够对总是已被先行假定为言语情境之前提的论辩可能性和有效性条件作出反思”¹²¹⁽⁶⁴⁾。因此,“主体事件的前概念决定于先验实用主义论辩,就其与康德的‘先验自我反思’的方法一致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先验的’”¹²¹⁽³¹²⁾。也就是说,反思一个人自己的思想的合法性条件,反思如下事实:我作为论辩思想的意义,不仅是由于我意识的综合功能,而且是由于语言的公共意义而可能。因为远离康德主义和现代语义学主义,我们的论辩预设了主体间有效的思想的主观结构由语言的公共意义而部分决定,这种语言的意义却部分地依赖于意义意向的人类主体的解释。因此我的论辩就成了实用主义的论辩。意向性的主体通过指号解释而享有了公共意义,或者说,意向性的主体通过意义的指号解释而融入了主体间沟通。因而作为主体的“我”的个体意向性以蕴含于语言指号中的主体间性的公共意义为前提。个体意向性论断的主体间有效性必须诉诸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才能证实。故“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是意义意向性的先验主体”¹²¹⁽¹⁴¹⁾。因而,“交往共同体被证明为一种先验的视界,在其中理论和实践发生汇聚”¹²¹⁽¹⁶⁾。阿佩尔认为,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作为先验主体,保障了自我反思式知识的主体间有效性的可能性。

再次,重视论辩的奠基性。

阿佩尔认为,“一种当代的先验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对论辩活动本身的意义反思,从而也包含对意义蕴含的反思。这对所有论辩者(无论立场如何)来说就是终极的和不可回避的东西”¹¹¹⁽⁵⁸⁾。论辩,意味着对本身观点的辩护,而且还意味着对辩护本身的反思。因此,它具有“奠基”的功能。自亚里斯多德以后,辩证法和证明法是两种迥异的思维方法,而笛卡尔以来的方法论唯我论者则更看重证明,他们认为真理或理论只要能给出一种自圆其说的证明就行了,严密的逻辑证明意味着理性思维的进步。阿佩尔则认为,证明依赖于未经批判的前提,这种前提的证明又需自明的前提,而方法论唯我论者由于抽离掉了语用学维度,因而对前提的回溯将导致无穷倒退,而论辩,是在一种主体间的情境中持据而辩,而且还能反思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它远比作出证明就独断地宣称其正确的思维方式更为合理。

但是,阿佩尔认为,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辩的先验反思功能所具有的价值几乎不被注意。个中原因是分析哲学对论辩的语用维度的抽象,使

人们把“终极基础论证问题”仅作为逻辑陈述或命题前提问题来思考。因为对语用指号维度的抽象,导致了论辩的人类主体隐匿,因此不可能反思总是先行假定了论辩之可能的条件了。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逻辑”把论辩的“语用维度”和反思维度抛给了经验心理学,而经验心理学决不会把它视为对知识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的反思的反思。因此阿佩尔认为论辩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被人们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

阿佩尔的观点是,关于哲学基础的讨论,我们必须预设合理性的论辩意志,否则这种讨论本身是站不住脚的。论辩意志是一切对经验条件的探讨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他试图从作为意义理解和真理一致性的“主体间解释统一体”中去发现作为论辩之出发点的先验反思。这种解释统一体能在无限论辩共同体中根据互动经验来达到。阿佩尔认为,通过论辩,我们可以实现终极奠基,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人的长远道德行为策略推导出两个根本性的规整原则:“首先,在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中,重要的是保证作为实在共同体的人类的生存;其次,要紧的是在实在共同体中实现理想交往共同体。”¹¹¹⁽³³⁸⁾这是阿佩尔先验论辩所要达到的目标。

最后,关于真理的共识理论。

阿佩尔认为,关于真理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概念把事实与观念之间的符合作为在世界中的实体之间的关联,这样一种真理观被笛卡尔以来关于认识论的主客关系的思想所预设的批判标准视为错误的东西而被消除。任何考虑思想与实体之间的本体论一致都将导致无限回归,因此,“真理的符合论概念必须被抛弃而代之以融贯性理论,即通过定义预定要解释的所有真理的可想象的标准(在无限意义上)之间的系统联系是真理的一个可能的最终标准和规范原则”¹²¹⁽¹⁸⁵⁻¹⁸⁶⁾。但阿佩尔认为,这种融贯性真理标准或规范原则,没有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可能世界的思想和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之间区别的标准,这样,我们就可能把关于可能世界的一些理论或假设(因为它是融贯性的)作为真理来接受。因此,阿佩尔认为,求助于皮尔士的先验指号学“这个纯粹的真理的融贯性理论的理想主义缺憾就显现了”¹²¹⁽¹⁸⁵⁻¹⁸⁶⁾。皮尔士反对真理的融贯性理论,表明指号表达或感性判断中的谓词的使用,必须参与到指标和图像功能中,在感性情境中直接获得其意义。因而阿佩尔认为作为陈述和现实之间相符合的证明,必须以某种形式与融贯性标准合并,以便把我们关于真实世

界的很不确定的知识与关于可能世界的只是融贯性的想象区分开来。

阿佩尔认为,皮尔士已经提出了先验指号学的基本要素或真理的先验实用主义的共识理论。皮尔士认为,康德的“物自体”即实体只能被视为是最终“可知的”(对无限解释共同体而言),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自行消解的思想与作为一个最后共识在探究者的无限共同体中的关联的规范思想相一致。在此,阿佩尔认为,康德的先验意识作为主体和客体合法知识的保证的思想被无限的指号解释的共同体思想所替代,这个无限的指号解释共同体的共识是我们所能设想的主体间合法性和我们知识的真理性的惟一的不可超越的最终标准。相应的,在康德的“统觉综合”中的客观材料的先验统一体(被康德假设为一种先验综合,即证明和融贯性的真理标准和先验意识)替代为或改造为指号解释的最终统一体的假设或规范原则,它由关于意义和陈述的真理性的共识所达成。实体作为知识的经验客体不被视为事实上已认识的而是最终可知的,也就是说,作无限探究共同体的“终极观点”的客体。因此,在阿佩尔那里,真理不是观点与实体相符合的一种状态,也不是一种理论内部和理论之间互相融合的理论,而是无限的解释共同体在无限的解释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

三、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后果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基于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改造而提出,它保留和发展了康德哲学式的先验性和规范性;阿佩尔同时又把目光投向皮尔士的指号学理论,通过以语言沟通共同体为中心概念的先验语用学融合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从而最终完成“语言学转向”,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因此,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直接理论后果即是沟通和融合欧陆人文主义和英美科学主义。

在阿佩尔看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直到最近,这两种哲学传统几乎还没有什么相互接触”^{[11](1)}。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所幸的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语言游戏论的提出,以及皮尔士的指号三元关系理论中对语用学的重视,都使两大思潮在主体间性的共同话题

上走向对话和沟通。因此,他认为“两大思潮的对峙将导致分析哲学重建为三个阶段: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在第三阶段的评价时,一个广泛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汇集将变得很明显,必需超越哲学和在语言的主体间理解和行为和客观解释方法之间的辩证中介化”^{[12](1)}。

阿佩尔本人一直都在为此而卖力地工作着。在他之前,狄尔泰的工作使得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分裂成了作为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解释学之间严格区分的基础。阿佩尔断言,在社会科学中有两个不同的合法的认知旨趣,一个是用因果性术语解释事件,另一个是根据文化标准和主观意向来理解行为。对于因果解释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实用主义反思,不排除“统一科学”要素的声称。除非社会需求也包括理解,否则因果概念的先验基础将白掘坟墓。因此,“科学和客观性的概念不必扔给自然科学,实际上要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理性的一个延伸概念”^{[14](22)}。

阿佩尔认为,在当代,真正的解释学探究必须处于与自然科学对事件对象的说明活动的互补关系之中,这两种探究是互相排斥的,因此也是相互补充的。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都决不可能作为孤独的自我,仅仅为他自己而力求说明某事物,即便仅仅为了知道他应该说明什么,他也必须就这个“什么”与他人形成某种沟通。如皮尔士所论证的,自然科学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解释共同体。这种主体间沟通决不能还原为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论程序,因为这种沟通正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语言性沟通与客观科学构成互补关系。

最终,阿佩尔得出结论说,描述性的说明性的科学是以在从事科学的人类的交往共同体中的解释学沟通为前提的,而解释学的沟通却蕴含着对一切可供支配的事实信息的利用,也即说蕴含着经验分析科学。但就解释学的沟通也是关于需要和目标的沟通而言,它是以一门伦理学为前提的,并且同时也为这种被先行假定的伦理学——连同经验分析科学的信息——所要求。

因此,“阿佩尔的分析意味着不再必要以参与文化传统的概念来取代与客观性的自然科学概念相反的解释和理解的方法论联合,使得反思文化传统自身的理性成为可能”^{[14](19-20)}。也即是说,阿佩尔工作

对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融合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补功能的形成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卡尔——奥托·阿佩尔. 哲学的改造[M]. 上海译文出版, 1997.
- [2] Apel Karl Otto. Selected Essays[M]. ed. Eduardo Mendieta . vol. 1 Toward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 ,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 [3] 阿佩尔. 社会科学的解释学向度及其规范基础(上)[J]. 国外社会科学信息, 1993, (7): 26. 25- 26.
- [4] Apel Karl Otto. Understand and Explanation[M]. Trans. by Georgia Warnke . The MIT Press, 1984.

The character and academic consequences of Apel's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ZHANG Jin-jie, LIN Y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rising and booming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akes the linguistic turn in western philosophy in 20th century. But syntactic-semantics have not finished the linguistic turn. Apel thinks that people should supplement the syntactic-semantics with pragmatics. The main characters of Apel's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are represented as follows: the emphasizing of the transcendental status of language and subject ; the overcoming of methodology solipsism and the stressing of grounding character of argument. The academic consequence of Apel's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is the convergence of European-continental hermeneutic and Anglo-American scientism.

Key words: Apel;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European-continental hermeneutic; Anglo-American scientism